

西周史征

尹盛平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Z 4N00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周史征/尹盛平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5613-3005-7

I. 西... II. 尹... III. 中国-古代史-西周时代 IV. K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4182 号

责任编辑 吴红霞 **责任校对** 何伯君 **装帧设计** 吉人设计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 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http://www.snuph.com> E-mail: if-centre@snuph.com)

印 制: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377 千

版次印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 账号:0303070-0033000469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序 言

1968年,我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被分配到陇县牙科乡梁甫村劳动锻炼一年多,又临时在陇县知青办工作一年多。1971年分配我去搞行政工作,后经我个人要求,被改派到陇县文化馆任文物专干,从此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1974年春夏之间,我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姜寨遗址发掘工地,学习田野考古发掘半年,8月间回到陇县征集了曹家湾乡南坡村出土的矢仲戈等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10月间与卢连成等宝鸡市博物馆的同志对南坡村残存的几座西周墓进行了清理发掘。1976年3月,有幸参加了周原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扶风召陈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遗址和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专家俞伟超、严文明先生主持发掘。他们不仅指导工地的发掘工作,而且还为我们讲授考古课程,使我们取得了考古理论与实践的双丰收。当年秋季,我协助俞伟超先生主持扶风召陈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发掘。1976年底我调入宝鸡市博物馆,从1977年开始主持扶风召陈遗址的发掘工作,直到发掘工作结束。这期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戴彤心先生曾利用两个暑假的时间,帮助我们发掘过召陈遗址的大壕沟G1,取得了召陈遗址完整的地层,并帮助我们进行了陶片的拼对和整理,使我完成了田野考古全过程的学习与实践。

1979年我被调到宝鸡市文化局任文物科副科长、陕西周原考古队副队长,主持周原沟东区(扶风境内)的发掘工作,组织了扶风刘家村姜戎墓地和黄堆村、齐家村西周墓以及强家村一号西周墓的发掘。1981年,我主持宝鸡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根据武功县尚家坡村出土的几件先周青铜器提供的信息,发现了武功县郑家坡(包括尚家坡、桥东村在内)的先周文化遗址,随后对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历时四年,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使我们对先周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段时间内,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我还组织了宝鸡市戴家湾和福临堡遗址的发掘。1986年,由于工作调动,使我从此失去了参加我所热爱的田野考古发掘的机会,至今感到遗憾。

回顾我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十余年的过程,周原考古的六年时间,是最重要的阶段,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当时我和俞伟超先生朝夕相处一年时间,经常深夜长谈,同时与严文明先生也过从甚密。这不仅使我在学问上受益匪浅,而且他们提携后进,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及在学术上的高瞻远瞩,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我终生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怀念、感激之情。正是在他们的引导与影响下,此后不久我便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周原西周宫室制度初探》,就是在俞伟超先生讲授的《先秦宫室制度》的推动下写成的。

俞伟超先生如今已经作古,我借助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他表示深深的哀思和永远的怀念之情。回忆周原考古和武功县郑家坡先周遗址的发掘,我还十分感激原周原文管所的刘连山、赵升祥、李景茂等同志,他们在生活上、业务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周原考古工地的王均显、陈全良和宝鸡市考古队任周芳、刘军社、张天恩、张建林等一大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几乎常年顶烈日、战严寒,不辞辛苦地工作在田野考古工地,为考古事业贡献了青春。如今,他们中有许多人已事业有成,我也感到十分幸慰。

宝鸡是周秦两个王朝的发祥地,由于工作环境与工作经历,决定了我的专业方向为商周考古与西周历史研究。我的研究工作,起初只限于周原考古与宝鸡地区商周考古发现的某些资料涉及的问题,对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并不全面、系统。1993年,李学勤先生举荐我撰写他所主编的《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中的《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一书,使我有机会对西周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涉猎。正是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对西周历史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同时随着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使我认识到过去发表的文章里,有的文章中有错误之处,有的文章论述不深不透,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因此产生了尝试用金文和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写一部西周史的想法。这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之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充实、提高以往的研究成果,总结自己从事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收获。这部书从2001年开始,用了两年多时间写成。第一、二章从周族的起源直到西周灭亡,论述了周族早期与西周王朝的有关历史;第三章是关于西周一些制度的考证。由于自己的学识有限,本书未能对西周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本书中除了沿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法外,还大量引用田野考古资料作为证据,对周族早期和西周的历史进行了论证,因此命名为《西周史征》。本书写作过程中,每一个章节虽然几易其稿,经过多次修改,但是仍会有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先生的关怀和支持,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2004年2月作者于西安

目 录

第一章 周族的起源与发祥

第一节 先周文化与周族起源	(1)
一、先周文化的探索历程	(1)
二、姜戎与姜戎文化	(6)
三、先周文化的类型与年代	(17)
四、早周文化与周族的起源	(27)
五、先周族的世系与起源地	(29)
第二节 周原与周族发祥	(31)
一、肥美的周原	(31)
二、周原是周族的发祥地	(34)
第三节 西周的强国与吴太伯、仲雍奔“荆蛮”	(38)
一、太伯、仲雍所奔“荆蛮”的族名	(40)
二、强国文化的性质与“荆蛮”的族属	(42)
三、巴族弓鱼人为什么被称为“荆蛮”	(53)
四、鱼国文物中有关弓鱼人是“荆蛮”的证据	(57)
五、西周鱼国的南迁	(60)
六、吴国国名的来历	(61)
七、矢国不是虞国	(63)
八、虞国早期在陕西省陇县	(64)
九、太伯、仲雍为什么要奔“荆蛮”	(69)
十、西虞的改封	(70)
第四节 犬夷与犬戎	(72)
一、犬夷是嬴姓秦夷	(72)
二、犬戎是允姓之戎	(77)

第二章 西周史新证

第一节 武王灭商与成康分封诸侯	(82)
一、武王克商	(82)
二、武王“封功臣谋士”是为其封“采邑”	(83)
三、西周分封诸侯国始于成王	(86)
四、康王改封诸侯	(89)
五、分封诸侯时的“授民”问题	(89)
六、分封诸侯的目的与作用	(92)

第二节 西周的都邑	(93)
一、丰镐遗址与宗周	(96)
二、洛邑遗址与成周	(102)
三、周原遗址与周邑	(104)
第三节 康王东征与北伐	(111)
一、康王征东夷	(111)
二、康王北征方雷、北戎、鬼方	(117)
第四节 邢国的改封和郑邢、丰邢世族与邢国的关系	(120)
一、康王改封邢国	(120)
二、郑井(邢)、丰井(邢)与邢国的关系	(122)
第五节 昭王南征荆楚	(126)
一、昭王第一次南征得胜回归	(126)
二、昭王第二次南征而不返	(129)
第六节 穆王中兴与礼乐盛行	(135)
一、穆王东伐淮夷西征犬戎	(135)
二、奔京礼乐盛行	(139)
第七节 西周蚌雕塞种人头像与西王母之邦	(141)
一、周原遗址出土的蚌雕塞种人头像	(141)
二、西王母之邦与塞人部落	(145)
第八节 共王时代的社会变革	(147)
一、共王时代社会安定	(147)
二、共王时代礼制发生变革	(149)
第九节 淮夷的反抗与周王室的衰微	(155)
一、淮夷的反叛造成周王室衰微	(155)
二、宣王加强对淮夷的控制与榨取	(161)
第十节 厉王革典与国人暴动	(164)
一、厉王搞国家专利	(164)
二、关于“国人暴动”	(165)
第十一节 玁狁的兴起与平王的东迁	(167)
一、严允的兴起	(168)
二、周姜交恶造成西周王朝灭亡	(173)

第三章 西周制度考

第一节 西周官署机构与爵位制度	(175)
一、西周的官署	(175)
二、西周的爵位	(187)
第二节 金文世族与宗法制度	(191)
一、郑邢与丰邢世族	(192)
二、虢季世族	(194)
三、微史世族	(196)

四、单氏世族·····	(202)
五、西周宗法制度解读·····	(204)
第三节 西周的宗庙与昭穆制度·····	(208)
一、周王室的宗庙·····	(208)
二、西周的昭穆制度·····	(213)
第四节 周原建筑基址与西周宫室制度·····	(218)
一、前堂后室·····	(219)
二、太室与东西夹室·····	(220)
三、东西厢与东西房·····	(221)
四、周原建筑的性质与等级·····	(221)
第五节 西周的人物雕像与西周的服饰制度·····	(228)
一、西周玉人、铜人雕像反映的西周贵族服饰·····	(228)
二、西周玉人、铜人雕像反映的平民、奴隶服装·····	(233)
三、西周少数民族服装与发型·····	(234)

插图目录

图 1 刘家墓地陶器·····	(8)
图 2 宝鸡市石咀头等地出土的刘家文化陶器·····	(9)
图 3 刘家文化分期图·····	(11)
图 4 阿哈特拉类型陶器分期图·····	(14)
图 5 辛店文化陶器·····	(15)
图 6 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遗址分布图·····	(17)
图 7 郑家坡遗址早期陶器·····	(19)
图 8 郑家坡遗址出土青铜器·····	(19)
图 9 郑家坡遗址中期陶器·····	(20)
图 10 断泾遗址的陶鬲·····	(21)
图 11 沔西先周文化陶器·····	(22)
图 12 郑家坡与沔西先周陶器比较·····	(23)
图 13 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分期图·····	(26)
图 14 周原地区略图·····	(32)
图 15 周族迁徙图·····	(35)
图 16 竹园沟一号墓陶器·····	(42)
图 17 宝山 C 型陶鬲与鱼国铜鬲、仿铜陶鬲比较·····	(44)
图 18 鱼国文化与宝山文化陶器比较·····	(46)

图 19	城固,四川彭县竹瓦街,宝鸡竹园沟、茹家庄出土青铜斧、钺比较图	(49)
图 20	城、洋 b 类钺发展演化图示	(50)
图 21	城、洋 d 类钺演变图	(51)
图 22	宝山文化与路家河文化陶器比较	(54)
图 23	茹家庄一号车马坑一号车的青铜辕饰	(57)
图 24	竹园沟四号墓青铜兵器、工具、用具	(59)
图 25	宜侯矢簋铭文	(71)
图 26	商文化京当型所见铜器	(73)
图 27	京当类型文化陶器	(74)
图 28	捕鸟形族徽	(76)
图 29	寺洼文化分布图	(80)
图 30	寺洼文化诸地点遗存典型陶器比较图	(81)
图 31	利簋铭文	(82)
图 32	墙盘铭文	(83)
图 33	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墓出土铜器	(84)
图 34	克罍器铭文	(85)
图 35	小臣单觶铭文	(86)
图 36	禽簋铭文	(86)
图 37	余簋铭文	(87)
图 38	麦尊铭文	(97)
图 39	丰镐遗址图	(99)
图 40	周原凤雏 H11:20 号甲骨文摹本	(100)
	周原凤雏 H11:117 号甲骨文摹本	(100)
图 41	诒簋铭文	(101)
图 42	何尊铭文	(102)
图 43	洛阳发现的西周遗址墓葬分布示意图	(102)
图 44	岐周遗址图	(109)
图 45	小臣誡簋铭文	(112)
图 46	鲁侯簋铭文	(113)
图 47	旅鼎铭文	(115)
图 48	雪鼎铭文	(116)
图 49	师旅鼎铭文	(117)
图 50	匚乙亥乍父丁方鼎及铭文	(118)
图 51	邢侯簋铭文	(121)
图 52	中方鼎铭文	(126)
图 53	遇伯簋铭文	(128)
图 54	𠂤駿簋铭文	(128)
图 55	作册曷卣铭文	(130)
图 56	旃鼎铭文	(130)

图 57	旂觥铭文	(131)
图 58	戎方鼎(Ⅱ)铭文	(137)
图 59	戎簋铭文	(138)
图 60	戎与淮夷战争示意图	(138)
图 61	遘簋铭文	(140)
图 62	80FCT45:2 号西周蚌雕人头像图	(142)
图 63	80FCT45:6 号西周蚌雕人头像图	(142)
图 64	九年卫鼎铭文	(149)
图 65	虎簋盖铭文	(150)
图 66	齐家西周墓出土的仿铜陶礼器	(152)
图 67	三年裘卫盃铭文	(152)
图 68	舍寓(字)于厥邑(厉邑)图解	(153)
图 69	史密簋铭文	(157)
图 70	鄂侯驭方鼎铭文	(160)
图 71	兮甲盘铭文	(161)
图 72	驹父盥盖铭文	(163)
图 73	大孟鼎铭文	(166)
图 74	多友鼎铭文	(168)
图 75	不娶簋铭文	(171)
图 76	毛公鼎铭文节录	(175)
图 77	趯孟铭文	(177)
图 78	丰邢叔簋铭文	(193)
图 79	丰邢叔家族墓地墓葬分布图	(194)
图 80	师觶鼎铭文	(194)
图 81	郑虢仲簋铭文	(195)
图 82	旂鼎铭文	(197)
图 83	30 号疾钟铭文	(198)
图 84	员鼎铭文	(199)
图 85	商尊铭文	(201)
图 86	甯农鼎铭文	(202)
图 87	沈子也簋铭文	(205)
图 88	令彝铭文	(209)
图 89	司(嗣)母目(姒)康鼎铭文	(211)
图 90	司(嗣)母目(姒)康鼎图	(211)
图 91	刺鼎铭文	(215)
图 92	凤雏甲组平面复原设想图	(218)
图 93	召陈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平面图	(219)
图 94	召陈 F8 复原设想图	(220)
图 95	召陈 F5 复原设想图	(220)

图 96	凤雏甲组建筑复原设想图	(223)
图 97	扶风召陈甲区西周建筑群外观示意图	(224)
图 98	召陈 F3 复原设想图之一	(224)
图 99	召陈 F3 复原设想图之二——上层圆顶	(225)
图 100	召陈乙区建筑基址平面图	(226)
图 101	西周贵族人物雕像图	(229)
图 102	西周的组玉佩	(232)
图 103	西周平民、奴隶、少数民族人物雕像图	(234)

第一章 周族的起源与发祥

第一节 先周文化与周族起源

西周王朝是周族建立的,研究西周的历史,首先应了解周族的起源。《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椒,麻、椒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於邠,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集解》引徐广曰:“今鬲乡在扶风。”《索隐》云:“即《诗·生民》曰‘有邠家室’是也。邠即鬲,古今字异耳。”《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鬲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邠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括地志》所说的“故鬲城”,是秦汉时期的鬲县城,在今陕西武功县武功镇西南二十二里,即今陕西扶风县的法禧村一带。“古邠国”,是指周始祖弃的封国,按传统的说法是在今武功县和杨陵区一带的漆水下游。由于这一带是“古邠国”,所以战国晚期秦国在此设鬲县,后世因境内有武功山改称武功县。所以,汉唐以来认为周族是起源于漆水下游的古邠地。然而1931年,钱穆先生提出周族起源于山西晋南说,他认为:“周人盖起源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邠,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大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①此说影响极大,后来主张周族起源于山西的学者有吕思勉、陈梦家、邹衡、王玉哲、徐中舒、李仲立、王克林、李民、杨升南、刘起钎、方述鑫等。^②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先生也说周族起源于山西,到古公亶父时西迁至陕西^③。当然,也有不少的学者仍认为周族是起源于漆水下游的古邠地。从考古学的角度,要解决周族起源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到先周文化。

一、先周文化的探索历程

钱穆先生提出的周族起源于山西说,虽然并不成立,但是对于后来为揭示周族起源而开展寻找周文化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3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在渭河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并于1934—1937年,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墓地进行了重点发掘。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的石璋如先生,在陕西长安、武功、岐山、旬邑、彬县等地,对传说的周都邠、邠、周原、丰、镐进行了实地调查。

①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

②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先周历史初探之一》;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刘起钎《姬姜与氏羌的渊源关系》;方述鑫《姬周族出于土方考》。

③ 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

这些都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周族起源的尝试,而在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考古发掘最有成效,于1948年和1954年,出版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两本发掘报告。作者苏秉琦先生依据器物类型学,对墓葬出土的瓦(陶)鬲进行了分类,共分为袋足、联裆、折足、矮足四类,划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期的年代推断为周武王伐商以前。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长安县沣河西岸的遗址,全面揭示了西周文化的面貌^①;1959—1960年,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H10与H11的叠压打破关系^②,从地层上第一次确凿证明了苏秉琦先生斗鸡台瓦鬲墓初期早于瓦鬲墓中期的论断;1959—196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彬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③;196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沣西张家坡、客省庄发现了先周时期的墓葬。这一时期是寻找先周文化阶段。

先周文化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先周文化研究。先周文化是指西周王朝建立以前的周族文化,也就是周族先公、先王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一命题是由邹衡先生提出来的^④,徐锡台先生称之为早周文化^⑤。邹衡先生不仅确认了一批先周文化遗存,还将其分为二期,推定第一期的绝对年代为商代廪辛至帝乙帝辛早期;第二期的绝对年代为商周之际。他认为先周文化的来源有三:一是东方的殷墟文化;二是东北方的山西光社文化;三是西方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并将宝鸡姬家店、晁峪出土的早于先周第一期的高领袋足鬲称之为“姜炎文化”。徐锡台先生确认了沣西、周原、彬县下孟村发现的早周文化遗存,提出早周文化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一些齐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胡谦盈先生认为“姬周袋足鬲和瘪裆鬲,似渊于寺洼文化”^⑥。张忠培先生提出:“先周文化以高领袋足分裆鬲著称,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以单把联裆罐形鬲为特征,两者不属于一个谱系,先周鬲是自有渊源的,从这个角度看,很难把客省庄二期文化说成是周族的原始文化。”^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应当说是先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属于开创阶段。由于受出土资料缺乏的限制,当时学者都把斗鸡台瓦鬲墓初期的高领袋足分裆鬲当作了先周文化的标志,有的学者甚至只承认高领袋足鬲属于先周文化,而把联裆鬲,也就是瘪裆鬲,通通划归西周文化。但是,正是这一时期对先周文化的研究,又一次促进和推动了有关先周文化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先周文化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为中国考古一个新的热点。

1976—1978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了岐山县贺家村先周、西周墓地^⑧;1977—1981年,扶风县博物馆发掘了扶风县北吕先周、西周墓地^⑨;1979—198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发掘了凤翔县西村先周、西周时期的墓葬^⑩;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

② 《陕西长安户县调查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③ 《陕西彬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④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⑥ 胡谦盈:《姬周陶鬲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⑦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⑧ 《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⑨ 《扶风北吕周人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⑩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和墓地；^①1981—1982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了扶风县刘家村墓地^②；1981—1984年，宝鸡市考古队发掘了武功县郑家坡遗址^③。

扶风刘家墓地与武功郑家坡遗址，其遗存呈现出两类不同的文化面貌。刘家墓地是以高领袋足分裆鬲、双耳罐、单耳罐、腹耳壶，以及偏洞式墓和棺外置石块、陶器口部压盖石块等为主要特征；而武功郑家坡遗址是以联裆鬲、折肩罐、敞口盆、敛口瓮、敞口簋、敞口尊等为主要特征，而且晚期地层有西周早期遗存。由于西周文化与郑家坡遗存一脉相承，而且地层又证明郑家坡早、中期遗存早于西周，所以我们提出郑家坡遗存是先周文化，而刘家墓地遗存是姜戎文化，将其从先周文化中分出来，称之为刘家文化。依据地层，将郑家坡遗址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当时在没有可比照材料的情况下，考虑到早期陶器中有类似二里头文化因素等，故推测早期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头下层时期，中期年代约在太王迁岐以前，晚期年代约在文王作丰时^④；当时在没有地层依据，也没有掌握高领袋足鬲演变规律的情况下，将刘家墓葬划分为六期，年代估计为二里头下层时期至周人迁岐^⑤。

武功郑家坡遗址和扶风刘家墓地材料的公布及长武碾子坡遗址部分材料的公布，再一次推动了先周文化研究。考古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除我们的看法以外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同郑家坡遗存是典型的先周文化，刘家遗存是姜戎文化，但是提出郑家坡遗址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殷墟二期，还对刘家墓葬的分期提出了批评，不同意分为六期，赞同分为三期。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家坡遗址除了高领袋足鬲以外，所有联裆鬲都是西周早期遗存，郑家坡遗址的年代为西周早期，不认同郑家坡遗存是先周文化。这实际仍然是只承认高领袋足鬲是先周陶器，而把联裆鬲都看作是西周遗存。还有一种观点虽然认同或部分认同郑家坡遗址是先周文化，但是仍然坚持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是先周文化。有的学者把宝鸡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瓦鬲墓初期，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看作是郑家坡先周文化类型并存的另一个类型的先周文化；有的学者更提出高领袋足鬲是“典型先周陶器”，认为把高领袋足鬲“排斥在先周文化内容之外，而称之为‘姜戎式鬲’，是不妥当的”，并提出碾子坡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先周文化。

这一时期关于先周文化的大讨论，再一次促进了先周文化的考古发掘。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对扶风壹家堡商代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⑥；1991—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宝鸡市考古队，对林由县蔡家河、园子坪商代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⑦；1991—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武功县岸底村先周遗址进行了发掘^⑧；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礼泉县朱马咀商代遗址进行了发掘^⑨；1995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

① 胡谦盈：《试论先周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② 《扶风刘家姜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③ 《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④ 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⑤ 《扶风刘家姜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⑥ 《陕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⑦ 田仁孝、张天恩、雷兴山：《碾子坡类型刍议》，《文博》，1993年第3期。

⑧ 《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⑨ 张天恩：《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打印稿，1997年。

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在彬县断泾村先周遗址进行了局部钻探和发掘^①;与此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旬邑孙家村先周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②;1997年,为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在沔西毛纺厂东,发掘了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前的H18、H12、H7等先周文化晚期灰坑,取得了重要的收获^③;为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课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还在岐山王家咀商代遗址、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进行了发掘^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应当说是先周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属于深入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全面揭示了先周文化的面貌特征,使先周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经过十多年的讨论与验证,对于郑家坡、断泾、沔西类遗存是先周文化,而刘家类遗存是姜戎文化,已基本上取得共识。当然还有学者仍坚持高领袋足鬲是先周文化,认为碾子坡、斗鸡台类遗存是先周文化^⑤,究其依据,无非是丰京遗址内的先周晚期遗存有高领袋足鬲。我们认为斗鸡台类遗存不是先周文化,首先,斗鸡台瓦鬲墓不是姬周族的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B3出土两件西周早期铜当卢,内壁均有阳文“矢”字,而且斗鸡台北面的贾村原多处发现西周矢国铜器;斗鸡台以西的纸坊头、高家村、晁峪,以北的金河,以南的石咀头等地,都有以高领袋足鬲为特征的姜戎文化遗址和墓地,因此斗鸡台瓦鬲墓是矢国的墓葬,而矢国姜姓,是姜戎。因此,斗鸡台瓦鬲墓初期,属于刘家文化,也就是姜戎文化,根本不是先周文化。斗鸡台瓦鬲墓初期的年代早于武王伐纣,而瓦鬲墓中期的年代又为西周早期,陶鬲为周式联裆鬲。但是当年苏秉琦先生并没有说瓦鬲墓初期是先周文化,只是后来被学者误认为是先周文化遗存,而错把高领袋足鬲当作了先周文化的标志。扶风刘家姜戎墓地的发掘,证明斗鸡台瓦鬲墓初期的高领袋足鬲,是由宝鸡姬家店、石咀头、晁峪、金河等地姜戎文化早期的高领袋足鬲发展而来;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又证明斗鸡台瓦鬲墓中期的联裆鬲,是由先周的联裆鬲发展而来。这正如俞伟超、张忠培先生所说:“在这种意见(按:指《斗鸡台》的《结语》中的意见)发表后的三十多年中,许多人显然对这一推断的方法论根据的深刻性认识不足,纷纷想从锥脚袋足鬲的发展系统来寻找周文化渊源,但总是不成功。不久前,宝鸡市文管会的同志在武功尚家坡(按:尚家坡与郑家坡属于相连的同一个遗址)开始找到了折足类鬲从联裆到瘪裆的中间阶段典型标本,终于看到其前身的确不同于锥脚袋足鬲的前身;而他们在扶风刘家发掘的一处墓地,又说明那种锥脚袋足鬲,原来是源自陕甘邻境地区另一支属于羌戎系统的青铜文化的”^⑥。

先周文化中确实有少量高领袋足鬲,但是高领袋足鬲不是先周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从姜戎文化中吸收而来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在先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高领袋足鬲虽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但是西周早期的袋足鬲,形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高领袋足鬲比较,已是面目全非,并最终消融在西周文化中。

其次,长武碾子坡类遗存,虽然有与先周文化相同的器类,例如折肩罐、敞口盆等,但是陶

① 《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材料待发表。

③ 《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④ 材料待公布。

⑤ 王魏、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

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又有偏洞式墓,这些文化特征与扶风刘家姜戎墓葬相同,属于刘家文化谱系,因此有些学者已指出碾子坡类遗存属于姜戎文化或其分支^①。彬县断泾、旬邑孙家等古豳地内,相当于殷墟一期先周文化的发现与确认,在地域和时代空间方面,将碾子坡类遗存排斥在先周文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长武碾子坡不在文献记载的豳地内;第二,同一时代,相邻地域的同一个族体,不可能形成文化面貌差异很大的两种文化。

坚持高领袋足鬲是先周陶鬲,认为斗鸡台、碾子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的学者,怀疑漆水流域能否存在一支与关中西部商文化京当型不同的另一类象郑家坡类这样很有特征的文化,因此提出郑家坡类遗存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认为郑家坡类遗存很可能是古公亶父迁岐后,归附于周人的某个“他旁国”的文化,从而否定郑家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②。商文化京当型主要分布在礼泉、兴平与扶风、岐山县境内,如果说郑家坡类型文化遗存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那么这四县境内首先应该有郑家坡类型的文化遗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四个县境内并未发现郑家坡类型的早期文化遗存,而郑家坡类型早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在这四县之间的漆水流域,这个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怀疑归怀疑,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商文化京当型之间的漆水流域,不可能存在一支与商文化京当型不同的郑家坡类先周文化。事实上,从二里冈上层时期到殷墟二期时,关中西部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其中商文化京当型分布在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腹地以及泾水下流的礼泉、兴平一带。商文化京当型分布的区域正在“邠岐之间”,因此商文化京当型的族属当是畎夷^③。畎夷之君即殷墟卜辞中的犬侯,其都邑犬丘在今兴平境内。畎夷是西方秦人的先祖,属于东夷的一支,商代早期进入关中平原西部。商文化京当型分布区以西,分布着刘家文化,即姜戎文化,其族属是姜姓的羌戎。在商文化京当型之间的漆水流域,分布着郑家坡类型的先周文化,其族属是姬姓周族。至于泾水上游,还分布着姜戎文化和断泾类型的先周文化。

畎夷、周族、姜戎三族居地交错,虽然相互之间也有冲突,例如《殷墟卜辞》记载,商王多次命犬侯率军扑周,即攻伐周族,但是三族在文化上,却彼此渗透,互相影响、择优吸收。商文化京当型中既有郑家坡类型因素,也有高领袋足鬲;而郑家坡类型中,既有商文化京当型因素,也有姜戎文化因素,例如杨凌杜家坡、柴家咀、武功郑家坡等遗址,就发现商文化京当型的假腹豆、分裆鬲等,还有高领袋足鬲;姜戎文化中有先周文化的折肩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中东部商文化,早期基本没有郑家坡类型因素,而晚期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墓葬,例如西安“老牛坡墓地基本只随葬联裆鬲和折肩罐,与北吕等先周墓相同,而与殷墟典型商人墓葬不同”^④。但是这一现象并不能证明郑家坡类型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而恰恰说明关中地区商文化中的郑家坡类型因素,是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吸收而来。商文化京当型由于邻近漆水流域,所以在二里冈上层时期就出现郑家坡类型因素,例如礼泉朱马咀遗址、扶风壹家堡遗址。关中东部商文化,由于距离漆水流域较远,而且中间又有商文化京当型的阻隔,所以郑家坡类型对其发生影响的时间晚一些,到殷墟时期才出现郑家坡类型因素。

① 田仁孝、张天恩、雷兴山:《碾子坡类型刍议》,《文博》,1993年第3期。

②④王魏、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③《后汉书·西羌传》说:“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商文化京当型分布在“邠岐之间”,应是畎夷的文化遗存。

扶风刘家姜戎墓地早期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二期,所以至迟在殷墟二期时,西面宝鸡市区一带的姜戎首先东进到岐山之下,到达商文化京当型的分布区。相当于殷墟三期左右的扶风壹家堡遗址三期陶鬲,变成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且高领袋足鬲的形态较前两期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姜戎文化这时对商文化京当型的影响加强了,或者说姜戎族已进入了商文化京当型地区。古公亶父迁岐后,与姜姓结盟,“实始翦商”,将猷夷赶出了周原地区,猷夷西迁甘肃礼县一带。所以相当于殷墟四期早段的壹家堡遗址四期,完全变成了郑家坡类遗存,商文化京当型的踪迹彻底不见了。

商文化京当型的礼泉县朱马咀遗址,第一期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其中A类,即商文化因素占65%,是B类,即郑家坡类先周文化因素的两倍多。第二期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A类、B类因素略微减少,新出现的E类因素,即断泾类先周文化因素却很突出,占有10%的比例。第三期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稍晚,A类因素减少15%,B类因素上升4%,E类因素增加较快,达到18%的比例^①。这一统计资料表明,商文化京当型从开始到消失,先周文化对其渗透、影响在逐步加强,但是其文化性质始终未改变,仍是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郑家坡类型和断泾类型先周文化在商文化京当型中,是外来的文化因素,根本不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另外,在商文化京当型壹家堡遗址中,姜戎文化的渗透逐步加强,而朱马咀遗址中,一期中没有姜戎文化因素,二期、三期中也极为少见,这一方面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距离较远,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郑家坡类型、断泾类型先周文化的阻隔。姜戎文化在朱马咀遗址所表现的渗透力弱,特别是在关中东部商文化中,根本不见高领袋足鬲,这种现象与郑家坡类型对关中东部商文化的渗透正好相对应。

沔西毛纺厂灰坑H18的时代相当于文王居丰时,由于其文化面貌与郑家坡类型的一致性,所以,它的发现已可确证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武功郑家坡、岸底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文化上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晚期都有西周早期遗存,其本身也证明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郑家坡类遗存不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二者是同时并存的两支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回顾对先周文化的寻找、探索与研究历程,已走过了60多年的漫漫长途,将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属于寻找和发现周文化,全面揭示西周文化面貌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属于探索研究先周文化,初步揭示先周文化面貌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属于全面揭示先周文化面貌,深入研究先周文化,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阶段。

二、姜戎与姜戎文化

中国的远古时代,氏族林立,传说众多。徐旭生先生把中国史前时期众多的氏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一個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黄帝,一个叫炎帝”^②。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姬姓周族属黄帝族的一支,其族与炎帝后裔姜姓氏族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先周文化与姜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讨论先周文化和周族起源时,不得不先讨论一下姜戎与姜戎文化。

^① 张天恩:《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打印稿,1997年。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国语·晋语》说：“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炎帝以姜水成”，说明炎帝族是在姜水流域形成的，那么姜水就成了探索炎帝族起源地的主要线索。刘起钎先生说：“既然古姜、羌字同，那就很有可能姜水即羌水。《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古羌水已见上引陇西郡羌道县下……即发源于陇西郡临洮（今岷县）南境，至羌道（今舟曲）与《禹贡》恒水（今白龙江）合，再东南至武都郡阴平（今甘肃文县）东与自岷山南麓逶迤西北的白水江汇合，然后东南至广汉郡入西汉水（嘉陵江）。因其流程全在羌族区域内，故称羌水。”^①刘先生所说的姜水，是包括洮河、白龙江、白水江在内的西汉水。传统所说的姜水在周原腹地。《水经·渭水注》说：“岐水出石桥山，东南流……二川洋逝，俱为一水，南与横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谓之小横水，亦或名之米流川，迳岐山而又屈迳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所谓居岐之阳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矣。又历周原下，北则中水乡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盗食穆公马处也。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俗名小横水，又叫米流川，即今凤翔县境的横水。此水东南流，在岐山县城西南注入大横水（雍水），以下通称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以下又称为姜水。由此可知，凤翔县横水河以下的雍水，即今天岐山、扶风县境内的沔水（古雍水下游），就是《水经注》所谓的姜水。《元丰九域志》卷三说宋代岐山县境内有：“岐山、终南山、渭水、姜水”，另外，姜氏城传说在扶风县城东，这也说明今天的沔水就是姜水。沔水得名为姜水，当是因为姜姓的羌戎在此居住。《国语》的说法只能反映商代的史实，并不能证明炎帝族最早的起源地在那里。

炎帝族是古代西北著名的氏族，最早的起源地应在甘青地区，其后裔分为两大支：一支是河湟间的羌族，另一支是不断向东迁徙的共工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鲁语》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九有”“九土”皆为“九州”之别称，古今语的不同而已。共工氏居住在黄河出山入平原北转的地方，即今河南省辉县一带^②。由于共工氏族能平定“九州”的水患，所以称霸“九州”。战国以前，“九州”是指夏族曾居住过的晋南、豫西地域^③，正是古代洪水成患的中心地区，共工氏居住的辉县便在“九州”地域内。文献中有说共工氏防治洪水有功的，也有说共工氏因防治洪水不得法而遭到灭亡的。《国语·周语下》说：“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这是说共工氏族治理水患时，不肯遵守“不堕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塞泽”的规则，偏要壅塞河流，把高地铲平，把低地垫高，使得上天不保佑，百姓不帮助，造成祸乱并兴，从而走向了灭亡。共工氏族兴起于何时不能确指，但在帝尧时仍然是一个显赫的氏族，为当时的“四凶”之一，被尧流放于幽陵，即今河北北部。

共工氏族的后裔继承祖业，继续帮助大禹治水并取得成功。《国语·周语下》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於羽山。其后伯禹——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四岳即四嶽，是共工氏族后裔中的一支。大

① 刘起钎：《姬姜与氏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③ 尹盛平：《獬豸、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